

重庆号巡洋舰起义——

驶向人民的怀抱

■ 汤炎忠

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率领舰上574名官兵起义。这艘巡洋舰从国统区上海吴淞口出发，驶向解放区山东烟台港，从此摆脱国民党统治，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有力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

为何一艘军舰起义能掀起如此惊涛骇浪？这还得从它的来历说起。

重庆号巡洋舰原属英国皇家海军，该舰重7000余吨，全长约154米，宽约15.5米，额定功率6.4万千瓦，最高航速每小时32海里，续航力4000海里。舰上装有不同口径的主炮、副炮、高射平射两用机关炮22门，高射机枪8挺，鱼雷发射管6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将其赠予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如获至宝，将其改名“重庆”号，并任命11岁即投身于海军、曾两次赴英国海军留学的邓兆祥担任舰长。这艘巨无霸，成为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最大最强的主力战舰，被视为“王牌”军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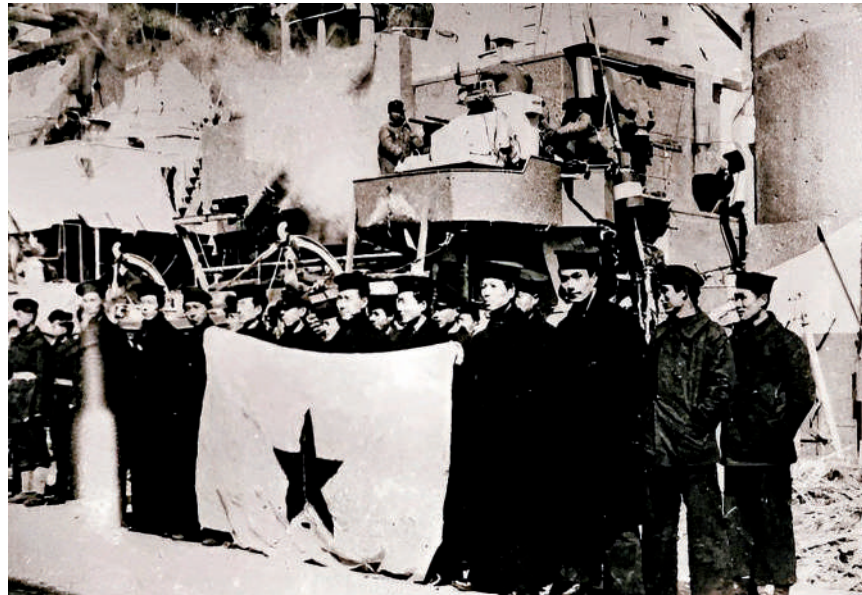
审时度势，谋划起义。重庆号加入国民党海军不久，便卷入内战旋涡。1948年10月，为挽救东北战场的败局，国民党政府派重庆号到辽宁葫芦岛支援地面部队。几天后，他们又将这艘军舰调往营口，充当掩护江西兵团司令廖耀湘部撤退的平台。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将重庆号调防长江下游，配合江阴要塞，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

舰上官兵当年多是怀着报国为民的理想赴英留学，如今完成学业归来，在目睹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一系列罪行后，对国民党打内战的前景产生怀疑，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产生憎恨，不愿参加反人民的内战，纷纷考虑另谋出路。

在此形势下，舰上的进步官兵开始与中共地下组织成员进行秘密联络，很快在舰上形成两大秘密组织。

一个是“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核心力量，它以毕重远、陈鸿源、王颐植等人为骨干，成员共27人，来自轮机、枪炮、通信、雷达等主要部门。其中，毕重远是潜伏在舰上的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也是策划组织重庆号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另一个是以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等16人组成的起义组织。该组织先后与南京和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秘密联络，谋划起义事宜。



1949年3月4日，组织领导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的“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全体成员，在葫芦岛港码头展开自己制作的白底红星起义旗帜。

此外，舰长邓兆祥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名爱国军人，邓兆祥抱持着“中国要强大，必先强我海防”和“雪我甲午耻辱”的信念参军，先后经历了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进一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与堕落深感失望。早前，中共中央南京局的负责人之一董必武曾通过民主人士何燹，找到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第五署署长周应融做邓兆祥的工作。在民族大义与真理面前，邓兆祥承诺在时机成熟时起义。

周密行动，默契配合。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刚驶出黄浦江口，突然奉命在吴淞口锚地待命。

面对形势突变，“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他们推测重庆号下一步的作战目标很可能是阻止解放军过江，于是决定正式起义。

2月25日凌晨，担任值班更的毕重远率先行动。按照约定计划，他与上甲板的岗哨班班员会合，发出起义信号。随后，他迅速打开武器柜，给“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每人配发长、短枪各一支。领到装备后，大家马上分头行动。

警戒组人员先是切断舰上的通信联络电路；同时布置岗哨，将军官住舱的交通要道牢牢把守住；再关闭通往士兵舱的后墙门，切断前后舱的联系，把各业

务部门和人员住处分隔开。与此同时，行动组人员将甲板上的哨兵、司令走廊的值班士兵诱至雷达室缴械。毕重远、陈鸿源、王颐植等核心成员，则分头前往高级军官的舱室进行谈判。

舰长邓兆祥事先并不知晓下属官兵也在酝酿起义，在得知“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的行动后，他毅然加入其中，并着手研究驶向解放区的航海图。邓兆祥的参与令起义人员备受鼓舞，他们通过舰上的广播电台，向全体官兵宣读刚刚草拟出的两份宣言，阐明起义宗旨，动员全体舰员拥护起义。大部分官兵积极响应，主动担负警卫和值更工作。

25日清晨，邓兆祥按照新鲜出炉的航海图，设计瞒过了国民党海军当局。之后，在邓兆祥指挥下，重庆号熄灭所有灯火，从吴淞口起锚，向解放区烟台港开进。

重庆号的航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所幸邓兆祥的丰富经验为航行提供了保障。他全程沉着冷静，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妥善处理了与美舰遭遇等几起险情，并急中生智改变航线，成功摆脱驻青岛基地的美国海军，使军舰顺利通过国统区。

兵不血刃，成就壮举。2月26日凌晨，当重庆号临近解放区子午岛时，我军驻岛部队率先发现了这艘庞然大物。因没有接到重庆号要起义并经过

防区的情报，他们丝毫不敢怠慢，马上将“敌情”电话报告给烟台警备区司令部值班室，请示应对之策。值班的作训股长刘元兴回答：“做好战斗准备，若军舰不开炮，我们也不开炮。”

接到指令后，驻岛部队便严密监视着重庆号的一举一动。

此时，山河同寂，仿佛在迎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随着红彤彤的朝阳升起，只见一艘巨大军舰缓缓行驶在平静的海面上，舰上的火炮全部上仰60度、炮口朝天，以示无意开火射击之诚；舰上有人挥舞着白旗，以示弃暗投明……7时左右，重庆号顺利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港，受到当地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起义，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壮举。它给本就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当局沉重一击，气急败坏的蒋介石，闻讯后火速派出飞机跟踪轰炸。为躲避敌军，重庆号于3月4日转移至东北解放区葫芦岛港。3月5日，舰长邓兆祥率全舰574名起义官兵，专门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致电表达敬意。

遗憾的是，在国民党空军狂轰滥炸下，重庆号不幸于3月20日凌晨沉于海中，6名战士也在战斗中光荣捐躯。

正当大家陷入悲痛之时，3月24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联名复电邓兆祥舰长及全体官兵表示嘉勉：“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祝你们努力！”

此后，在重庆号的示范带动下，国民党营垒中的爱国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2艘舰船在南京江面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三机动舰队由彭楚才等人领导下，率领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起义；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在长江口外起义……他们与重庆号起义官兵一起，成为组建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

史说新语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赵破匈奴之战是战国后期(由于史文有阙,战役发生的具体年份无可考),赵国名将李牧在代郡(今河北省蔚县附近)、雁门郡(今山西省右玉县附近)一带大败匈奴的一场经典战役。此战中,赵国以步兵为主的联合兵团对匈奴骑兵兵团的围歼战术,给日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带来重要启示。

养兵避战

战国时期,赵国领土大致包括今山西省北部和中部、河北省西部和南部,其北部领土与北方草原游牧区接壤,因而时常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到战国晚期,匈奴、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强大起来,尤其是匈奴经常南下入侵赵国北部边境地区,并大肆劫掠。赵国大将李牧奉命驻守代郡、雁门郡后,深入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对匈奴采取预防为主、策略,设法使匈奴产生骄傲轻敌的情绪。

李牧按边防需要重新设置官吏,使之适于战备;将收取的租税全部用来养兵,以改善官兵生活;带领士兵操习骑射,提高部队战斗力;在边境地区修筑烽火台,作报警联络之用;派出大量间谍深入边外,以随时掌握匈奴动态。李牧还给官兵制定严明的军纪,并下令:如果匈奴人来犯,立刻进城堡自保,有胆敢出战捕捉匈奴人的一律斩首。如此一来,匈奴骑兵既无攻坚兵器及手段,又难掠到牲畜食粮,每次进犯均毫无所获,被迫退去。几年过去,赵国边境地区损失极少。

全歼匈奴

李牧的做法十分奏效。匈奴认为他兵弱胆小,不敢出战,便不再把他放在眼里。时间久了,李牧避敌不战的事情传到赵王耳中,赵王派人斥责了他,但李牧依旧如故。

赵王一怒之下罢了李牧,另派将领驻守北部边地。新将领到任后,每当遇到匈奴进犯,就主动率兵出城迎战。然而,赵军胜少败多,损失惨重,交战地区的日常农牧受到很大影响。于是,赵王下令让李牧复职,但李牧称病不出。赵王强行起用李牧。李牧表示,只有允许他继续使用此前的办法,才能领命。赵王答应了他。

李牧回到北部边地,一切照旧。此后几年,匈奴数次入侵都无功而返,渐渐对李牧这支部队没了戒心。其实,李牧没有放松军队的操练,士兵个个弓马精熟,骁勇善战。这些士兵日日受赏却无用武之地,纷纷请缨出战。敌军骄惰无备,赵军求战心切,李牧见时机成熟,便精心挑选了1300余乘战车和1.3万余匹战马,外加5万余名步兵和10万余名弓箭手,加紧操练,准备发起攻击。

之后,李牧让百姓出城放牧,用漫山遍野的牛羊引诱匈奴入侵。匈奴果然上当,派出小股部队发起试探性进攻,李牧佯装败退,丢下数十人和大量牲畜逃走。匈奴单于听说后,忙率大军入侵。李牧见状,出其不意地派出奇兵,从左右两翼对匈奴进行包抄合围。匈奴轻率冒进,很快陷入赵军重围之中,10万骑兵全军覆没。李牧随后率军掩杀,破东胡、降林胡。匈奴单于只得引兵远遁,10余年不敢进犯赵国边境。

制胜秘诀

纵观李牧破匈奴之战的过程,他采用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毕其功于一役”的对策,即通过一次战争给予匈奴毁灭性打击,使其无力再犯。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对策,源于他对敌我双方现实情况的清晰认识。对匈奴人而言,放牧和战争掠夺都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入侵掠夺可以补充匈奴经济产出之不足。因此,如果赵国不能重创匈奴主力使其无力再犯,那么匈奴人不久之后又将卷土重来。对于以农耕为主的赵国而言,频繁的战事会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性影响,可谓

同样不宜沿用。1952年9月,党中央为表彰大悟人民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借红色根据地大悟山之名,将礼山县改名为大悟县,一直沿用至今。

大悟县现为湖北省孝感市管辖,从这里走出了大将徐海东,上将刘华清,中将周志坚、聂凤智、程世才,以及少将31位。

以安徽金寨、河南新县、湖北大悟等地为代表的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了解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史时所说:“我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绝不能忘记老区人民,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链接历史

李牧破匈奴之战

■ 于涌泉

得不偿失。

因此,李牧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诱匈奴主力部队倾巢而出,进而对其进行毁灭性打击。要做到以上两点,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首先,应使对方骄傲轻敌,不加戒备,轻起大军。此前李牧始终避敌不战,正是通过“卑而骄之”之策,成功使匈奴人认为他胆怯。李牧又在与匈奴先头部队交锋时诈败,最终引得匈奴大军尽出。

其次,给予匈奴足够的诱惑。此前每当匈奴进犯,李牧便令军民牲畜撤入城中,使匈奴的劫掠一无所获。这不仅使己方避免损失,还让匈奴无法务食于敌,无法起到“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的效果。这种情况维持数年后,李牧大规模放出城内牛羊,匈奴单于果然中计,尽起大军前来抢夺。

再次,己方应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及时了解匈奴军队的动向。而这正是李牧修筑烽火台并大量派出间谍的目的。

最后,努力增强赵国军队战斗力,实现各兵种之间的密切配合。匈奴属于马背上的民族,骑兵众多,战斗力强且机动灵活。尽管赵国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但在弓马骑射方面与匈奴人存在差距,因此在正面野战中,赵国军队胜算不大,新将领多次出战不利正体现了这一点。不过,匈奴人同样存在弱点,那便是军队内部配合不足,组织纪律性差,“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于是,李牧决定设计围歼匈奴主力,要实现这一点,便需要提升自身战力及配合程度。李牧平时抓紧训练,在最后的围歼战中充分发挥了各兵种的优势,用战车和弓箭手限制匈奴骑兵的机动性,用步兵和骑兵完成包围,最终全歼匈奴主力。《孙子兵法》称“十则围之”,但李牧仅用了两倍于敌的兵力,便成功完成这一目标。

相关链接

围歼战

围歼战是一种以包围并歼灭敌人为主要特征的作战方式。它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非攻城略地为主要目标,主要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人的方法,有时也借助地形的帮助。对于在战略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来说,使用围歼战可有效、迅速地减少敌人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改变自己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战国时期的高粱河之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和辽西战役等,都是围歼战的典型代表。



山西省代县雁门关景区历代名人壁上的李牧石雕像。

三个“将军县”的特殊由来

■ 胡遵远

1955年至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1614名高级将领被授予将军军衔。其中湖北红安、安徽金寨、江西兴国、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河南新县、湖北大悟、安徽六安、湖南浏阳等10个县,因将军数量众多而被称为“将军县”。

在全国十大将军县中,安徽金寨、河南新县、湖北大悟这3个县彼此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它们同属大别山区。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区,是我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

此外,这3个县都是国民党政府为加强鄂豫皖边区地区的反动统治而新增设的县份。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蒋介石本想采取“增设县治、分而治之”的方法来加强他的反动统治,未承想新增的3个县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后来都成了赫赫有名的将军县。

改名“金寨县”,历史面目真。1932年以前没有金寨县,那时只有一个名叫金家寨的小镇。以金家寨为中心的金寨地区位于大别山腹地,这里马克思主义传播早,党的组织建立早,革命武装起义早,红军队伍诞生早,革命根据地形成早。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严重地影响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是,蒋介石就调集大批部队对金寨等地进行多次“围剿”,前3次均以失败而告终。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为破解困局,蒋介石还公开许诺:谁的部队最先攻下金家寨,就以谁的名字命名设立一个新的县。9月20日,国民党军立煌部进占金家寨。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兑现战前许诺,

以金家寨为中心,打破鄂豫皖三省界线,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及河南省的固始、商城等县的交界地带,各划出一部分增设一个新的县,并以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9月2日,第3纵队8旅解放了立煌县城,3日解放了流波、麻埠。县委、县民主政府组建后,决定将立煌县改名为金寨县。县长白涛亲自撰写布告,张贴全县:“查我金家寨,大别山中心,革命根据地,中外有威名……改名金寨县,历史面目真……”从此,金寨这个县名载入史册。

金寨县现为安徽省六安市管辖,是仅次于湖北省红安县的全军第二大“将军县”,从这里走出了上将洪学智,中将皮定均、李耀、张贤约、陈先瑞、林维先、徐立清、曾绍山、滕海清,以及少将50位。

人民做主人,“经扶”换新称。1932年10月,在立煌部占领金家寨后,国民党“围剿”中路军刘峙部占领河南省光山南部重镇新集。新集是鄂豫皖苏区首府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将河南省光山县和湖北省麻城、黄安等县的交界地带,各划出一部分增设一个新的县,并以刘峙的字取名为“经扶县”。

1947年8月28日,刘邓大军一部击败了盘踞在经扶县境内的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12月,经扶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召开。会上,代表们提议更换县名,刘伯承考虑,县政府驻地在新集镇,此为一“新”;人民当家做主人,开始了新的生活,此为二“新”。于是,他建议将经扶县改为新县,得到了群众

的一致赞同。12月30日,经扶县改名为新县,一直沿用至今。



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全景照片。

同样不宜沿用。1952年9月,党中央为表彰大悟人民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借红色根据地大悟山之名,将礼山县改名为大悟县,一直沿用至今。

大悟县现为湖北省孝感市管辖,从这里走出了大将徐海东,上将刘华清,中将周志坚、聂凤智、程世才,以及少将31位。

“礼山”不宜用,“大悟”作县名。立煌县和经扶县设立后,蒋介石似乎感觉还不过瘾。在他看来,大别山区到处都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大别山地区山水相邻、人文相近,邻省、邻县交界地区距离城市较远,政令不畅,不便控制。

为“分而治之”,1933年1月,蒋介石下令将湖北省的孝感、黄安、黄陂及河南省的罗山、信阳等县的交界地带,各划出一部分增设一个新的县,并以当地的礼山之名称名为“礼山县”。

1949年4月6日,礼山县全境获得解放。礼山县虽然不像立煌县、经扶县一样以国民党将领名字命名,但是也是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反动统治而起的县名,